

上园派

研究资料选

——
蒋登科 / 主编

(上下)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SOU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630700 CHONGQING, CHINA



上园派

研究资料选 上

蒋登科 / 主编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园派研究资料选 / 蒋登科主编. — 重庆: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621-9583-2

I. ①上… II. ①蒋… III. ①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06642号

上园派研究资料选

SHANGYUANPAI YANJIU ZILIAO XUAN

蒋登科 主编

责任编辑: 张昊

装帧设计:  闰江文化

排 版: 重庆大雅数码印刷有限公司·瞿勤

出版发行: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网 址: www.xscbs.com

地 址: 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路2号

邮 编: 400715

电 话: 023-6825435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荟文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 × 240mm

印 张: 49.75

字 数: 866千

版 次: 2018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21-9583-2

定 价: 158.00元(上下册)

前言

新时期诗坛上的
「上园派」

□ 蒋登科

“新时期”这个概念虽然有一个“新”字，但是就当下的语境来看，它已经是一个历史概念。

“新时期”概念和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在这里，我们主要是从诗歌艺术、诗学发展的角度来使用它，因此和经济社会发展意义上的“新时期”肯定存在一些差异。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看，“真正找到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①。可以看出，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17年底党的十九大召开，这段近四十年的时间被政治理论界统称为“新时期”，而在党的十九大之后，“新时期”的表述则被“新时代”所取代。

因此，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新时期”有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内涵。广义的“新时期”内涵是就政治学、社会学意义来说的，指的是1978年以来的近四十年时间。在诗歌、诗学领域，我们可以沿用“新时期”的广义内涵，因为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诗、诗学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由关注外在世界延伸到关注内在世界，由单纯的群体意识延伸到对个人、生命的全方位关注，由单一的政治意识逐渐转向对世界的多元打量，而且，这种态

^① 刘建军：《从“新时期”到“新时代”》，《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0日。

势还在不断延续着。不过，在新时期以来的诗歌、诗学发展中，还是可以划分出一些特殊的时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时期”的狭义内涵，具体说，狭义的“新时期”在诗歌和诗学领域主要指新诗和现代诗学从单一走向多元的尖锐交锋时期，而在多元形态真正形成之后，多元就成为一种常态，诗学争鸣逐渐减少，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诗歌艺术自身了。因此，这里所说的“新时期”使用的是它的狭义内涵，大致从1978年到1986年。

|| 诗歌艺术探索：从“地下”到“地上” ||

中国当代新诗的发展经历了很多曲折。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到严重的“左”的思想的制约，极端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很多主题、题材、表现手法都成了“禁区”，中国的诗歌创作、诗学研究几乎处于一种停滞状态。一些在过去取得成就的诗人、评论家被迫停止思考和探索，政治化、公式化、概念化、单调化成为那个时期的诗歌、诗学的基本面貌。

1976年10月初，中央宣布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这标志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但是，由于受到长期的思想禁锢，再加上“两个凡是”的思想在当时还占据了主流地位，诗歌的创作和研究并没有取得本质上的改观。1976年1月复刊的《诗刊》是当代诗歌发展中最重要的一诗歌刊物之一，复刊之后发表的诗歌作品、诗学观点依然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主流观念存在着深度关联，极端地说，其实就是“文化大革命”诗歌、诗学观念的延续。

不过，在探讨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的时候，我们不能只关注公开出现的诗歌现象。作为关注社会、记录心灵的艺术样式，除了少数民歌民谣，诗歌都以个人创作为基本方式，其发展有时候和社会现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断裂”，只是这类作品有时候无法公开，而是以隐蔽的方式存在。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初期，文学、诗歌也并没有消亡。除了少数具有一定艺术特色的诗人以其独特的艺术智慧活跃在公开出版的报纸、期刊之外，很多诗人都以特殊的方式在“地下”“民间”生存、聚集。这就是所谓的“地下文学”或者“潜在写作”。在诗歌领域，“文化大革命”期间，艾青、牛汉、曾卓、流沙河、食指等诗人悄悄创作着关注现实、表达心灵的作品，只是由于特殊的外在原因，这些作品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才逐渐获得了和读者见面的机会。

这股潜流的第一次爆发是在1976年4月5日前后的“天安门事件”中。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人们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但却遭到了“四人帮”的阻挠和压制。这激起了人民更大的怒火，悼念活动蔓延到全国各地，4月5日前后在天安门广场形成了悼念的高潮。人们云集这里，将诗词贴在纪念碑上，挂在松柏枝叶间，并在人群中朗诵。

“天安门诗歌”大多为旧体诗词，在艺术上也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但是，其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对当时社会问题的关注，对那些颠倒黑白、是非不分的人、事的批判，对美好未来的期待等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公开发表的作品中几乎无法见到。这是诗歌干预社会、关注社会的优良传统的一次集中展现，也是人民心中聚集的愤怒和渴望的集中展现，是思想解放运动的肇始，是中国诗歌重新获得发展的前奏。但是，由于当时还处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的思想、情感还被禁锢着，所以天安门诗歌运动及其蕴含的思想解放的因子并没有在很广泛的范围内流传开去，而且此事件还被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如果说“天安门诗歌”存在诸多政治方面的因素，在体式上主要是以民歌和旧体诗词为主，群体意识远远超越了个人创造的话，那么，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逐渐形成的另外一股更加具有艺术性、探索性、创造性的诗歌潮流，就更值得关注了。一些远离政治、身处荒野的年轻诗人悄悄创作着他们认为具有价值、追求真实性的诗篇，并形成了一些各具特色的诗人群体，这些诗人群体包括后来人们认定的“北大荒诗群”“白洋淀诗群”等等。这些诗人是新时期诗歌变革的预备队伍，以“暗流”“地下”的方式影响着中国当代诗歌的进程。

“白洋淀诗群”是“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地下诗歌”写作的主要力量之一，也成为后来新时期诗歌艺术探索的主要力量之一。“白洋淀诗群”“开始于1969年，形成于‘文化大革命’中后期，1972—1974年达到高潮，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与知青返城而在1976年而终止”^①。但是，它的影响却远远

^①李润霞：《论“白洋淀诗群”的文化特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超过了这个时限和范围。白洋淀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众多的知青下放点之一，地处离北京较近的河北。因此，在白洋淀知青点中，人员构成比较特殊，其中有相当数量的人是家庭背景优越、能够接触西方文学作品的高干子弟。他们在下放地自发地组织民间诗歌、文学活动，逐渐形成了在后来的诗歌史、文学史上具有不小影响的诗歌群落。“白洋淀诗群”的代表诗人主要有芒克（姜世伟）、多多（栗土征）、根子（岳重）、林莽（张建中）、方含、白青等。在当时，全国的许多地方如北京、河北、福建、贵州等地，都有类似的民间诗歌写作活动，有的还形成某种“群落”的性质。这些诗人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写诗，当时正是“红卫兵运动”的落潮期，这使他们对“革命”感到了失望，精神上经历了深刻震荡^①，于是试图以个体方式对真实感情世界和精神价值进行探求。这些作品和当时的主流诗歌（在公开出版的报刊、诗集中发表的诗歌）相比，具有更多的个人元素、自由思考、探索意识和独立的艺术品性，具有更多的诗学价值，但也是在当时的语境之下不允许出现和存在的探索。这种艰难的生长环境和过程使这些诗人及其作品在诗歌史、文学史、文化史上的价值和地位就具有了先天的难以超越的特征。

有学者对这个群落在新诗现代主义思潮发展中的地位 and 影响做了如下评价：

如果说中国当代新诗潮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经过先行者食指、黄翔的逃逸和突围，为新诗潮摆脱“政治专制”的诗歌包围奠定了最初的状态和流向，那么，到了“白洋淀诗群”实际上推进、扩展了新诗潮的河道，一路容纳着不断汇入的诗歌溪流，正向成熟迈进。如果说食指、黄翔是以浪漫主义为主导，融合了现代主义的某些特色，只是初步开始了现代主义诗歌的长旅；那么，“白洋淀诗群”已经使兼容浪漫主义的现代主义诗风成为主导倾向，从而为现代主义诗歌在中国当代的复归和重现做了重要的铺垫。如果说同时期的贵州诗人、上海诗人的群体性还不够显著，诗人的分布也较为零散，规模还较小的话，

^① 这使我们想到了20世纪20年代一些作家的创作。随着五四运动的落潮，很多作家感到苦闷、彷徨，于是他们开始创作关注个人内心的作品，出现了小诗热潮，出现了鲁迅创作的《野草》等，这一时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殊时期，也是成果比较多元、丰富的时期。

那么，无论在诗人的数量、诗歌的成就和对“新诗潮”形成的直接、显性影响上，还是在群体性特征与规模上，“白洋淀诗群”都堪称新诗潮潜流期最具代表性的诗歌群体，是中国当代新诗潮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阶段。^①

当然，由于艺术风格、思想观念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和多样性，不少学者也认为，“白洋淀诗群”只是一个诗人群体，而不是典型意义上的诗歌流派。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这些诗人在当时只是以自己的方式写出自己的真实体验，也许对当时的艺术自觉可能产生的影响并没有多少预设和预测，但正是他们的这种艺术自觉引发了人们后来对于艺术、人生等多方面的思考，开启了中国当代诗歌、文学、文化发展的新的方向和道路。

从历史来看，“白洋淀诗群”的创作、探索活动好像在1976年就戛然而止了。但是，思想、观念的流动和影响往往不会因为某个时段、事件的结束而终止，而且在遇到新的、合适的氛围之后，还会快速地繁衍开来。这一批具有探索意识、能够独立思考的诗人在回到城市之后，仍然坚持了他们对于历史、现实和人生的关注与思考，而且不断将这种影响扩大开去，为后来新诗潮的公开出现奠定了基础。具体讲，就是催生了民间刊物《今天》的出现。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次将新的诗歌观念、艺术观念推向大众的是“今天”作家群，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创办了当代第一家民间刊物。《今天》的主要人物如北岛、芒克、多多等，其实早就认识。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始筹备和创办民间刊物，宣传自己的诗歌、艺术主张。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北岛和芒克开始筹备《今天》创刊。那是1978年一个秋天的晚上，北岛、芒克和画家黄锐（也就是星星画会的发起人之一）在黄锐家喝完酒之后，北岛提出是不是可以办一份文学刊物，芒克第一个拍手赞成，黄锐也很兴奋，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说干就干，北岛的弟弟赵振先记得，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被眼前的一切弄得目瞪口呆。他看到他哥哥和几个人正在忙着将一册册的书装订，北岛告诉振先，他们正在办一

^①李润霞：《论“白洋淀诗群”的文化特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本文学杂志，叫《今天》，这是第一期。振先看到，封面让一些粗黑的道道竖着分隔开来，一看就是铁窗，里面就刊登了北岛那首著名的《回答》。

伴随着第一期的面世，各种矛盾也出现了，主要原因是观点不同，会议经常不欢而散，除了北岛和芒克，其他编委集体退出《今天》，直到赵一凡、徐晓、周郅英、鄂复明等人的加入，才使《今天》没有草草完结。他们成了《今天》的中坚力量，他们更多的时候在幕后工作，用默默的耕耘来换取《今天》的荣誉。北岛说：“第一个阶段的《今天》一共出版了9期，从1978年12月到1980年的12月，实际上整整两年。以后我们就成立了‘今天文学研究会’。又出了3期的文学资料，我们组织了两次比较大型的朗诵会，在1979年的4月8日和1979年10月21日，这两次朗诵会，我想也可以说是自1949年以后唯一的。”

《今天》以诗歌最为著名。在并不多的几期刊物上，北岛、芒克、多多、江河、顾城、舒婷、严力等一大批诗人从《今天》走了出来，他们的诗在后来被称为“朦胧诗”并且因为《诗刊》等主流刊物的转载，而被大众所熟知。^①

可以看到，《今天》和当时的一些民间的诗歌、文学、艺术爱好者，尤其是“白洋淀诗群”中的很多诗人，是有直接联系的，其中的一些人还参与了《今天》的策划、编辑，一直是《今天》的主要成员。而且，通过北岛的联系，舒婷等人也成为《今天》的成员。可以说，《今天》集中了当时一大批具有才气，敢于在艺术上创新、突破的年轻诗人和作家，是中国当代文学意识觉醒和复苏的重要阵地。而且，这些诗人、作家大多有长达十年的创作经历，积累了很多作品，《今天》的创刊正好为这些作品找到了出路。有人认为：“《今天》创办后，十年潜伏期默默积存的大量诗歌终于得以走出地下，北岛、芒克、舒婷、严力、顾城、江河、杨炼等，都在《今天》上发表诗歌，这些压抑已久的声音，一经释放，产生了巨大的能量，感染并激励了无数年轻人。”^②这一评价应该说是客观的、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今天》是中国1949年以来第一个民间的文学刊物，是“地下文学”（或

^① 河西：《北岛与〈今天〉30年》，《南方日报》2009年4月12日。

^② 刘溜：《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http://www.eeo.com.cn/2009/0120/127756.html>。

者叫“潜在写作”)浮出地表的体现。该刊第一期出版于1978年12月,经过两年多的坚持之后,1980年12月停刊。在这段时间,《今天》共出版9期刊物和4种丛书。“每一期篇幅从六十页到八十页不等,内容有诗歌、小说以及评论。每一期的印量为1000本左右。”^①可以看出,《今天》的诗人和作家对于诗歌、文学是发自内心的投入的,他们除了自己创作外,还亲自编辑、印刷刊物,同时,他们对于政治变化非常敏锐,对于上层在观念上的冲突和变化揣测得很准确。这也使他们的作品先天就打上了明显的时代、政治印记。

历史的发展有时候有很多巧合。《今天》创刊和悄悄传播的时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正是在那次会议上,中央制定了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中,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节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学的“新时期”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 “传统派”与“崛起派”的论争 ||

1979年是中国当代新诗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年份。

对于当代诗歌的发展来说,仅仅依靠处于“地下”的《今天》是远远不够的,它最多只能在小圈子里流传和产生影响。他们让自己的作品走向公开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到处张贴刊物内容。

第二天(1978年12月23日——引者),北岛和陆焕兴、芒克三个人骑着车四处张贴《今天》,“三个工人两个单身,无牵无挂的,从我们家出发,我拿一个桶打好糨糊——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学会的。一人拿着扫帚涂糨糊,然后另一个人贴,因为冬天很冷,必须贴得快,要不然糨糊就会冻住,还得放盐防冻”。

他们把《今天》贴到北京当时重要的场所,西单、中南海、文化部,还有《诗刊》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社科院、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胆挺大的。”北岛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门口碰到了徐晓,以前就认识她。我们正黑乎乎地往墙上贴的时候,她忽然间冲过来。徐晓就这样接上了,她也很吃惊。

^① 刘溜:《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 <http://www.eeo.com.cn/2009/0120/127756.html>。

第二天贴到大学区，包括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①

这种到处散发、张贴的方式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其中就有《诗刊》的编辑。邵燕祥回忆说：

我是在1979年新年前后，从民间文学刊物《今天》上读到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的（有一天，吴家瑾在诗刊社外墙上看到张贴着的《今天》，兴奋地向我推荐）。当时眼前一亮，心也为之一亮。许久没有读到这样刚健清新的“呕心”之作了。我说“呕心”，正如说歌唱家的发声不单是靠的嗓子，而是发自丹田，他们的诗是从灵魂深处汲上来的，已经在心中百转千回或说千锤百炼过了，没有毛刺，更没有渣子，完整透明，仿佛天成。北岛冷峻，舒婷温婉，同样显示了诗人的风骨。我读到《今天》以后，征得几位领导的同意，首先是严辰的支持，就把北岛和舒婷的诗在1979年《诗刊》的三、四月号发表出来。读者一下子就被他们的诗歌吸引了。^②

《诗刊》的胆识在于，它敢于在合适的时候推出具有新观念、新手法的作品，在1979年的第3期、第4期先后选发了《今天》发表的北岛、舒婷的作品，引发了人们关注、思考，也可以说开启了诗歌艺术探索的新的时代。邵燕祥说：“这两首诗并没有排在杂志的显著位置，在每一小辑中也没有让它们打头，毋宁说是故意的安排，以减少可能遇到的阻力。然而我们的读者很敏感，他们还是在不起眼的第几十几页上发现了这两首诗，发现了陌生的诗人的名字。编辑部听到很多赞许的声音。”^③可以看出，《诗刊》和一些有良心的编辑为推动诗歌观念的新变，付出了大量心血。当然，效果也是很明显的。

1979年9月，另一家著名的诗歌刊物《星星》复刊，刊发了青年诗人顾

① 刘溜：《北岛与〈今天〉的三十年》，<http://www.eeo.com.cn/2009/0120/127756.html>。

② 邵燕祥：《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问》，《南磨房行走》，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211页。

③ 邵燕祥：《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问》，《南磨房行走》，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

城的《抒情诗 19 首》，并配发公刘的评论文章《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

通过这些方式，一些潜在的诗歌艺术探索、一些具有特色的诗歌作品走向了大众，使人们逐渐意识到诗歌可以有多种写法，诗歌艺术的探索可以是多元的。

但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的文学观念影响着一大批人，即使在经过了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国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主张之后，那种积淀时间很长、成了很多人思想根基的观念依然很强大，这使得一部分人很难在短时间内接受和那种观念相差甚远的新的观念。于是，从 1980 年开始，中国诗歌界、诗学界出现了一场时间不短的争鸣。这场争鸣导致了新时期三个重要的诗论群落的出现。

1978 年 10 月，刚刚恢复运作的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作家到大庆、鞍山采风，参与者中诗人甚少。1979 年 2 月，《诗刊》社首次组织大型诗人访问团赴海南岛、上海、青岛等地的“海上行”采风团，艾青为团长，孙静轩、韦丘等诗人参加。这些活动标志着诗歌界开始活跃起来。孙绍振说：“诗人启动了，理论家也就顺理成章地要有所表现，于是张炯、谢冕他们，当时可能已经组织了当代文学研究会，就策划了南宁的第一届诗歌理论研讨会。”^①人们习惯上把这次会议称为“南宁会议”或者“南宁诗会”，是诗歌界关于“朦胧诗”讨论的一次重要会议。

“南宁会议”于 1980 年 4 月 7 日至 22 日在广西南宁、桂林举行。出席会议的人员中恰好有多位在后来分别被划入“传统派”和“崛起派”的代表人物，如丁力、闻山、谢冕、孙绍振等。谢冕回忆说：“我是会议筹备组的，最初准备时，并没有要讨论后来的‘朦胧诗’，但是那个时候很敏感的人能够感觉到这个创作现象。应该说以《今天》为代表出现的这样一个‘朦胧诗’，那时候已经不是地下的处于一种被谈论的状态。有的人觉得很好，有的人觉得不好，有的人觉得很怪，有的人觉得一点都不奇怪，这是应该的，应该有的。”

^① 孙绍振：《孙绍振答程光炜问：我与“朦胧诗”的论争》，骆寒超、黄纪云主编《星河·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22 页。其实当时叫“全国当代诗歌讨论会”。

这是截然不同的看法。”^①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只要稍有机缘，讨论的话题就可能延伸开去。事情的起因是1979年10月的《星星》复刊号正好被带到了会议上。顾城的作品引起了一些与会人士的极大震动。有人赞赏，也有人质疑；有些作品被赞赏，有些作品被质疑，甚至被称为“古怪诗”。这些作品在参加会议的人员中引起了激烈争论，据孙绍振回忆：

一派主张对于“古怪诗”这样脱离群众，脱离时代的堕落的倾向要加以“引导”，而另一派以谢冕和我为代表，则为“古怪诗”辩护。当年还是中年讲师的谢冕提醒大家：每当一种新的创造产生，我们总是匆匆忙忙去引导，“采取行动”的结果，不但不是推动诗歌艺术的发展，而是设置了障碍。

……

反对派以老实巴交的丁力为代表，他不无忧虑地提出：危机不在于古怪诗，而在于古怪诗张目的“古怪诗论”。虽然双方语言已经相当的情绪化了，但是，气氛还是比较友好的。^②

会议之后，一些报刊敏锐地感到诗界的争鸣势在必行，准备发表文章参与讨论。《光明日报》就约请谢冕、孙绍振撰写文章。谢冕写的是《在新的崛起面前》^③，孙绍振写的是《诗与“小我”》^④，文章发表出来之后，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对谢冕文章的直接批判，主要是丁力在那之后发表的几篇短文——引发“传统派”受到关注并最终形成一个诗学群落的短文。

谢冕的文章发表之后，以丁力为代表的诗人、评论家进行了尖锐批判。“古怪诗”之说来自丁力对当时诗坛现状的一种概括：

当前诗歌的状况，基本是三派：一是写旧体诗词的，是古风派。一派是以很朦胧到很晦涩为特征的洋风派，古怪诗是属于这一派的。以上是两个小

① 王尧：《“三个崛起”前后——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之二》，《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

② 孙绍振：《孙绍振答程光炜问：我与“朦胧诗”的论争》，骆寒超、黄纪云主编《星河·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223页。

③ 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1980年5月17日。

④ 孙绍振：《诗与“小我”》，《光明日报》1980年7月30日。

派，是不宜提倡的，但也不要禁止。再有一个大派，就是国风派，是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或乐于接受的民族化、群众化倾向的诗派。^①

丁力还针对谢冕的观点提出了“古怪诗论”的说法。他说：“奇怪的是近来有一种古怪诗论，极力支持古怪诗，鼓吹古怪诗风。持这种古怪诗论的，可以以谢冕同志为代表。”他认为“现在的古怪诗，也是一种食洋不化的症候，‘让人读不太懂’的‘很朦胧’的朦胧诗和‘让人不懂’的晦涩诗，都没有学到人家的长处，而是吸收其晦涩难懂的特征，拾人余唾，陈腐不堪，还美其名曰‘创新’。何新之有！”丁力还引用谢冕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发表的一些观点对谢冕诗歌观点的变化提出了质疑，认为：“观点是可以改、也是允许改变的”，“但是他在往错误的方面改变，而毫不联系自己，老是教训人，自居于‘导师’地位，我就不得不指出他是昨是而今非了。为了一味颂扬古怪诗，一反自己的‘一贯的观点’，把自己对新诗的研究成果，把革命的诗歌理论，抛到东洋大海里去了，我觉得这是十分可惜的。这样对照一下，让他看看自己过去的话，是想促使他早点回到现实主义（包括积极浪漫主义的）的诗歌理论上！”^②可以看出，北岛、舒婷、顾城等人的诗首先触碰的是丁力等老一辈诗论家的诗歌观念。

如果说，“南宁会议”标志着关于新诗潮的讨论由民间走向学术界，那么，谢冕、孙绍振的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则标志着关于新诗潮的讨论又从口头讨论走向了报刊的争鸣。由于丁力等人发表文章对谢冕和“朦胧诗”提出尖锐的批评，尤其是《诗刊》的加入，使讨论逐渐成为一次全国性的诗歌事件。

事实上，当时这种以青年诗人为代表的新的诗歌思潮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根据喻大翔的说法：“据我们所知，一九七九年底至一九八〇年上半年，‘某种品类’‘难懂诗’‘晦涩诗’‘古怪诗’‘意境朦胧’‘朦胧感’‘朦胧美’‘新诗潮’等各种名目在诗坛相继出现。但自从《诗刊》一九八〇年八月号登出《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作者把自认为‘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一解’的诗，姑且名之为‘朦胧体’，‘朦胧诗’也就被接受下来，

^① 丁力：《新诗发展管见》，《诗歌创作与欣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6页。

^② 丁力：《古怪诗论琐议》，《诗歌创作与欣赏》，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12-313页。

叫开了。”^①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在这里直接使用“朦胧诗”这个名称。关于“朦胧诗”的讨论，最早开始于四川的《星星》，该刊1979年10月的复刊号发表的公刘的《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而大规模的讨论是在福建展开的。《福建文艺》在1980年推出了舒婷的作品，并从当年第2期开始连续发表文章展开了讨论。《福建文艺》还组织了研讨会，在会上，“支持派占了上风”^②，但批判派仍然有很大的力量，甚至有人把舒婷都说哭了。孙绍振在讨论会上发表了长文《恢复新诗的根本艺术传统——舒婷的创作给我们的启示》，把舒婷当作了新诗复兴的标志。

在这种讨论逐渐展开之后，《诗刊》于1980年9月20日至27日在位于定福庄的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招待所组织了一次全国性的“诗歌理论座谈会”，“邀请了北京和外地的部分诗歌理论工作者，以及《文艺报》《星星》《海韵》《诗探索》的代表，共23人。他们是丁力、丁芒、易征、孙绍振、尹在勤、任愆、严迪昌、李元洛、杨匡汉、吴超、吴思敬、宋垒、何燕平、张同吾、阿红、陈犀、罗沙、金波、钟文、郑乃臧、高洪波、黄益庸、谢

① 喻大翔：《朦胧诗精选·前记》，喻大翔、刘秋玲编选《朦胧诗精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关于这一说法，广州的《信息时报》2008年11月12日A24版刊登文章《朦胧诗：一代人透视黑夜的眼睛》说：“诗人钱超英撰文回忆说，很多人也许不知道，‘朦胧诗’这个概念，其实就是广东的发明。最初是广东作协负责编《作品》诗歌的黄雨撰文指责当时的新诗作品‘不足为法’，紧接着是经常在《羊城晚报》写评论的章明，发表了《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引发轩然大波。章明评价这些作品‘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认为他们是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不好的影响，过分个人化的意象与词汇使诗意显得晦涩怪僻，整体意境荒诞而诡异，有时还呈现某种灰暗低沉的情绪，有趣的是，他所提出的‘朦胧诗’这一本来是否定性的评价概念，后来却成为约定俗成的名词。”

② 孙绍振：《孙绍振答程光炜问：我与“朦胧诗”的论争》，骆寒超、黄纪云主编《星河·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1页。

冕”^①。据邵燕祥回忆，吴家瑾负责组织那次会议，他们“找了一批谢冕这样的，还有一批如丁力这样的‘反对派’”。在当时的会议上，“两边面对面争得脸红脖子粗，很激烈。但都是出于公心，研究问题，讨论得很好。不打棍子，不扯到政治上去。我们后来发表的时候也是不同意见你三篇我三篇，效果不错。像是个学术‘争鸣’的样子”^②。朱先树也是会议的驻会人员之一，而且参与撰写了会议的简记，他回忆说：“会议通过自由讨论、展开学术争鸣，对诗歌创作和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一次热烈而冷静的交锋，各种观点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七个日日夜夜，可以说是不眠不休，争论虽然激烈，但气氛却十分友好。这次会议把之前对诗歌的各种不同意见和争论，集中起来了，这就是诗坛著名的关于朦胧诗的大讨论。”^③座谈会讨论的内容比较广泛，但在诸多问题上都存在争议。根据会议综述的记载，争议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一、今后新诗应遵循什么道路发展；二、关于诗与现实的关系及“诗歌现代化”问题；三、关于学习外国；四、关于诗的感情真实性问题；五、关于自我问题；六、怎样看待青年诗人的探索。可以说，在任何一个话题上都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关于青年诗人的创作，根据当时的会议纪要，谢冕等人和丁力等人的观点几乎是针锋相对的：

（谢冕）的基本观点是，近一二年里出现的一批年轻诗人及他们的一些“新奇”“古怪”的诗，是新诗史上的一种新的崛起，它“打破了诗坛的平静”，“引起了习惯势力和惰性的惊恐与不安”。于是才有人指责这些“新”

① 吴嘉、先树：《一次热烈而冷静的交锋——诗刊社举办的“诗歌理论座谈会”简记》，《诗刊》1980年第12期。谢冕、孙绍振等参加者在他们的谈话之中谈到了座谈会的一些情况，参会人数、具体人员等均有所出入。这份“简记”是当时会议组织者留下的，而且点到了每一个应邀出席会议的人员的名字，基本数字应该更可信。作者之一的先树即朱先树。2009年10月31日，朱先树应邀参加重庆丰都县委、县政府主办的“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看丰都”采风活动，同行的还有著名诗人、《诗刊》前主编叶延滨。我向朱先生就这些问题进行咨询，他说，他记载的时间和具体参加人肯定是没有错的。当时，他和吴嘉作为《诗刊》的驻会工作人员一直参与会议，其间，《诗刊》的负责人邹荻帆、柯岩也先后参加会议讨论。在会上，丁力和谢冕争论非常激烈，而在一个晚上，柯岩和孙绍振的争论几乎如同吵架。

② 邵燕祥：《答〈南方都市报〉记者田志凌问》，《南磨房行走》，北方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17页。

③ 朱先树：《我在〈诗刊〉当编辑二三事》，《诗刊》2006年第1期。

诗为“古怪”，有人要引导这些诗回到狭窄的老路。他说，正是一批年轻人“首先对束缚人的精神枷锁提出了疑问”，他们的诗“思想上反叛了现代迷信，抛弃了诗歌为政治服务的狭隘见解”，在艺术上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并使之得到充分的发挥。

……

丁力同志认为，对青年诗人的诗要作具体分析，不能把古怪诗和新的一代青年诗人的创作混同起来。许多青年写了大量的好诗，反映现实生活的、人们能读懂的诗。对这些诗作，我们的某些诗评家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情，却偏偏把一些古怪的诗捧上了九天，认为是“新的崛起”，是投进黑屋子里的“几线光明”。他认为有一些青年诗人写了一些古怪诗，原不足惊讶，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他们一味吹捧，助长他们轻狂和骄傲的“古怪诗论”。^①

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则是在“定福庄会议”之后应《诗刊》编辑之约而写的，他说：“《诗刊》的会议结束后，我乘火车回去，《诗刊》编辑吴家瑾约我写篇文章。”^②经过几次反复之后，这篇文章发表于《诗刊》1981年第3期，同时加了编者按语。按语在简单概括了孙文的观点之后说：“编辑部认为，当前正强调文学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以及坚持马克思主义美学原则方向时，这篇文章却提出了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回应谢冕的主张的同时，进行了学理的提升。其基本观点主要体现在下面这段文字中：

谢冕同志把这一股年轻人的诗潮称之为“新的崛起”，是富于历史感，表现出战略眼光的。不过把这种崛起理解为预言几个毛头小伙子和黄毛小丫头会成为诗坛的旗帜，那也是太拘泥字句了。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这种新的美学原则，不能说与传统的美学观念没有任何联系，但崛起的青年对我们传统的美学观念常常表现出一种不驯服

① 吴嘉、先树：《一次热烈而冷静的交锋——诗刊社举办的“诗歌理论座谈会”简记》，《诗刊》1980年第12期。

② 王尧：《“三个崛起”前后——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之二》，《文艺争鸣》2009年第6期。